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毛泽东的秘书必备素养:政治可靠,工作勤恳

齐鲁晚报:在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》一书中,您写了毛泽东前后共37位秘书,这些秘书有怎样的共同特质?毛泽东对这些秘书有什么相同的要求?

叶永烈:这些秘书的共同特点,首先是政治可靠,工作上勤勤恳恳,像政治秘书这么重要的岗位还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。毛泽东本人也当过中共中央局的秘书(编者注:1923年6月,毛泽东在中共“三大”当选为中共中央局秘书),所以他对秘书工作比较了解。他担任中央局秘书时,有很强的档案意识,要求所有党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,还必须保留原件。此前,党的文件管理没有这么规范,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后,扭转了这种局面,开始注重保存文件。很多重要的文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战乱,保存了下来,现在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。

齐鲁晚报:毛泽东的秘书们后来的境遇如何?

叶永烈: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善始善终,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了国家的栋梁。像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谭政,后来成了开国大将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秘书江华,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当然,也有个别秘书当了大官之后,走上了另一条路,

比如江青和陈伯达。

齐鲁晚报: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如何搜集资料?您写过很多领导人的传记,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,在采访的时候有哪些心得?

叶永烈:我的采访用9个字归纳就是“第一手、高层次、大题材”。这次参加山东书展带来的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》、《陈伯达传》等今年出的6本书,以及去年的《邓小平改变中国》,这些书都是大题材、高层次,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。为了写作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》这本书,我直接采访过毛泽东秘书陈伯达、戚本禹、罗光禄、曾碧漪、童小鹏、李锐等人。书里面提到的为晚年毛泽东讲读诗文的芦荻,之前一直拒见记者,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。1990年,在她的一位友人的介绍下,我在北京采访过她。此外,我还采访过胡乔木的夫人谷羽、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江青秘书阎长贵、杨银禄。写这样一本书,要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,一本书的第一手资料占多少是最考验作者功夫的。实际上,采访这些高层次人士也有一个过程,突破了高层,再采访其他相关人士会容易很多。因为经常来北京采访,所以有人说我是“上海的北京作家”。



9月24日上午,著名作家张炜携新作《独药师》亮相山东书展,与学者顾广梅对谈,并与读者交流创作心得。作为“山东全民阅读形象大使”,张炜也谈及了经典阅读的重要性,他提醒读者,在网络时代,“阅读不能太时髦”。

张炜携《独药师》亮相山东书展——民族精神资源来自读书,阅读不能太时髦

本报记者 吉祥

齐文化为写作注入独特的基因

“在我的长篇小说里,《独药师》是最贴近现实的。”《独药师》在张炜心中酝酿多年,早在30多年前,他就在胶东半岛接触到了《独药师》中的一些资料。书中的主人公徐竟是一名职业革命者,他的人物原型是辛亥革命先驱徐镜心,为了搜集徐镜心的资料,他还专门找到徐镜心的后人了解情况。张炜透露,他在创作的时候喜欢将一些原型人物进行谐音化处理,“这样就使想象有了根柢,在写作的时候会一直记着这个人”。在《独药师》中,同样被谐音化处理的还有怀麟医院,这所由美国教会于光绪年间在胶东半岛创立的西医院,比协和医院的创办时间早了20年,在《独药师》中它以麒麟医院的名字出现。

“基督教在北方登陆最早的地点,就是烟台的蓬莱和龙口。”教会人员带来了教堂、新学和西医院,自然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冲击。胶东半岛还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,烟台是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,而

支部最重要的领导人就是徐镜心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,胶东半岛是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最好注脚之一,外来的西方文明和内在的革命浪潮在此交汇,而本地延续千年的长生术维持风气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独特的文化造就了徐竟这样的“异人”。在《独药师》中,以徐镜心为原型的徐竟既是一个准备随时牺牲的激烈革命者,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爱惜自己身体的人。很多读者都惊诧于主人公如此剧烈的反差,张炜解释说,现实中的徐镜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“这里的文化从小培育了他,竟然让他在革命生涯里写出了一本养生的书”。

养生这样的题材很难书写,张炜说,《独药师》的写作得益于胶东半岛本身就是养生的大本营,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方士的摇篮。张炜解释,不同于受儒家影响深厚的鲁文化,齐文化没有不语怪力乱神的禁忌。“我很小的时候,经常听到哪个老人活了一百多岁,有人长生不老。”

写作重大政治题材,掌握第一手资料非常关键

齐鲁晚报:您今年还出了一本新书《陈伯达传》,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写作经过?

叶永烈:这本书是国内唯一的一部关于陈伯达的专著,总共78万字,能够出版有三个原因。第一是因为独家,只有我采访过陈伯达。第二是陈伯达本人对“文革”是否定的。书的封面上有他的一句话:“文革”是一个疯狂的年代,那时候我是一个疯狂的人,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,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。”第三是因为这是一本很扎实的书,出版前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联合审读过。

齐鲁晚报:您在采访他的时候会注意什么?

叶永烈:我在采访陈伯达时充分尊重他,因为他是历史的重要当事人。一开始联系陈伯达采访,公安部

同意了,但陈伯达本人是拒绝的。后来熟悉了,他把在秦城监狱的交代手稿都给我了。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本书,但是他说,相信你写得好,不用看了。对待朋友要很真诚,我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前后持续了8年,光他的亲笔信我就有45封之多。王力临终前交代他的儿子,去世后第一时间告诉叶永烈,“他是可信赖的朋友”。

齐鲁晚报:在写作这些重大政治题材时,您是如何把握写作的分寸的?

叶永烈:之前我还写过《四人帮兴亡》,采访过很多相关当事人。应该说这种重大题材的写作非常敏感,在写作前我会系统学习中共中央文件,有关政策方针,从而把握写作的分寸感。写作这些书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站在什么立场,从什么视角看问题。

书展是读书的嘉年华,要让青少年更多地参与其中

齐鲁晚报:您的下一本书写的是什么题材?

叶永烈:下一本书是写万里的,这本书70万字,我去中南海拜望他,采访过他的多位秘书和子女,去他的故乡山东东营及母校曲阜师范采访,关于他的文献也看了很多,今年是万里诞辰一百周年,相信山东读者会很关注。

齐鲁晚报:您参加过很多地方的书展,如何理解书展的独特价值?

叶永烈:书展有三个作用。对读者来说,是读书的嘉年华。书展上的书多,而且很多是打折销售的。对作家来说,书展是一个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好机会。对出版社来说,书展是一个市场调

查的好机会。出版社通过书展,可以了解读者喜欢什么书,不喜欢什么书。

齐鲁晚报:您今年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过香港书展,香港办书展的经验对内地城市的书展有什么启发?

叶永烈:我参加过很多城市的书展,像北京书展、上海书展、香港书展和台北书展等,多数城市的书展都很看重青少年学生,为了照顾他们,将书展的时间安排在暑假,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其中。此外,香港书展还是两岸三地作家的一个交流平台,很多作家都看重。香港书展的讲座环境是最好的,讲座地点会安排在一个封闭的会场,讲座全程录像,最后还要出光盘。

网络时代破坏了文学阅读的能力

在读者见面会上,张炜多次提及写作《独药师》所面临的挑战,这一方面来自于要刻画符合历史语境的语言,“清末的语言和现在差别很大”,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呈现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“写久远的生活不得不如履薄冰,特别是写半岛的长生术,将一种虚幻、深入悟想才能触碰的东西化为实物加以表达,很不容易”。《独药师》在十几年的构思后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,张炜说这得益于43年的写作磨练和积淀。每完成一部好的作品,在张炜看来就像在自己家门口放了一块巨石,无形中为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增加了压力,“写了这么多年,都写得差不多了,为了写出不同的东西,要付出沉重的努力,但我只能接受这种挑战”。

作为多年来一直关注阅读的作家,张炜也在书展现场谈到了阅读的重要性。在读者见面活动的前一天,有朋友跟张炜说,现在阅读19世纪像托尔斯泰这类伟大作家的巨著很困难,因为网络时代让整个人变得浮躁,很难静下心来阅读。张炜也发现,尽管民众受教育水平提高了,但

现在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并不比过去多,“因为网络时代会破坏这种能力”。张炜由此想到了他阅读托尔斯泰时的触动,“被托尔斯泰死死摁住”,以此提醒读者阅读经典作品的重要性,“阅读不能太时髦”。

经典阅读让张炜持续获得写作的养分。“我走向写作的道路就是因为书读多了,想写出来。读书少了会写出一片垃圾,书读得越多,越能明白什么是优秀的作品,对自己的要求也就越高。”张炜多次对当下的阅读氛围感到过忧虑,他也经常呼吁大众多读书,在他看来,一个民族的精神资源必须靠读书涵养。时隔30年,张炜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出国访问时,被西方国家大大小小的民间读书会吸引的情形,“我在德国,被一家小型的民间读书会请去,在咖啡馆给读者朗读,他们也听不懂中文,但那种读书的氛围真是令人难忘”。

叶永烈:写传记,第一手资料最见功夫

本报记者 吉祥

烈携新书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》出席山东书展,并接受齐鲁晚报的独家专访。小平改变中国》等书奠定了他在纪实文学领域的地位。6月8日,叶永烈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,都畅销全国。近年来,他不断地推出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,《陈云全传》、《邓小平早年,他是有名的科普作家,无论是作为主要作者写就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还是之后创作的《著名作家叶永烈以高产著称。从6岁写出第一本书开始,叶永烈便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

叶永烈为读者签名。(本版图片摄影 张中)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曲鹏
美编:牛长婧